

# 我校主办新中国七十年与越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上午，新中国七十年与越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国际大酒店嘉宾厅隆重举行。浙江省社科联一级巡视员邵清，校党委书记汪俊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陈

立旭，我校副校长寿永明，绍兴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柳巨波出席研讨会。著名明清文学文化研究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廖可斌，著名明清文学文化研究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朱万曙，著名戏曲史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仕忠，著名阳明学专家、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钱明，著名宋画研究专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勤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孔子研究

汪俊昌指出，作为越族文化、越地文化、越人文化的多维交融，越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文化的根脉所在，更是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立命根本。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的举措，对进一步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当代中国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必将推动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必将推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和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柳巨波在讲话中表示，越文化研究是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发展的 20 年间，学校在越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硕果累累。他希望绍兴市社科联能与学校就越文化研究展开更多、更深入的合作，共同推动越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推进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最后，邵清在讲话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持续推进越文化理论研究,深入挖掘越文化的思想内涵。二是要着力凸显越文化的当代价值，不断赋予越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打造传统学术优势。三是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着力提升越文化的影响力，展示区域文化，尤其要动员更多青年学者以探索精神，积极参与，促进越文化研究推陈出新。

此次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由我校主办，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承办，人文学院和学报编辑部等协办。会议围绕新中国七十年越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越籍当代文化名人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越籍当代文化学者的学科建树等主题开展讨论，聚焦越文化研究的前沿和若干重大问题，共同探讨越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传承创新，不断发掘学术生长点，不断丰富当前的越文化研究。

(越文化)

## 我中心专家在长三角江南文化研究学术

### 共同体建设工作圆桌会做重点发言

本报讯 10 月 30 日，“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长三角江南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工作圆桌会”在无锡召开，我中心执行主任、学报编辑部执行主编潘承玉教授应邀做重点发言。

本次圆桌会由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四省市社科联联合举办，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主持，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出席并致辞，四省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分管副主席做表态发言，四省市各有三位重点基地专家代表本省市做重点发言。

潘承玉的发言围绕《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江南文化支撑路径》主题，涉及三个方面内容：重温长三角江南文化一体化的历史路径，提出今天的长三角地区过去五千年经历一系列一体化过程，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历史时期经过一系列文化选择、文化浸润，从而自然而然形成的概念；探讨长三角江南文化一体化的现实路径，提出“物”“事”层面应包括长三角史前文明与出土文物研究、长三角稀见文献整理研究、长三角文化通史研究等；“人”的层面，应包括长三角文化名人研究、长三角文化世家研究、长三角人文精神研究等；“未来”层面即江南文化现代化方面，应包括长三角非遗项目传承创新研究、长三角景区文化建设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天际线”研究等；建议长三角江南文化一体化的操作路径，提出就像国家建有太湖流域管理局一样，应建立统筹三省一市长三角江南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的专业机构，汇集三省一市领导智慧和专家建议做出决策部署，各地分工协作。

与会期间，潘承玉还向有关领导、专家汇报和介绍了我中心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越文化)

## 我院参加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11 月 3 日，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新昌，共同见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成立暨“缘来新昌”浙东唐诗之路建设成果发布盛典，共商“唐诗之路”发展大计。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建武、浙报集团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副总编辑蔡李章、副县长胡玲萍，以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卢盛江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大会。我校副校长寿永明，越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诸凤娟应邀参会。

此次大会分四个环节：一是成立仪式，

二是专家主旨发言，三是小组研讨，四是实地考察。此次会议授牌绍兴文理学院唐诗之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为了更好地扩大越文化的影响力，推进我校对唐诗之路的学术研究，我院积极参与此次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期间，我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唐诗之路研究专家及绍兴本土的地方文史研究专家积极交流，一方面积极宣传越文化，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注越文化、研究越文化。

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唐诗之路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也为我校唐诗之路研究提供了契机和平台。(越文化)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陈君副主任一行到越文化研究院调研座谈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副主任陈君一行到我院进行调研并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我院执行院长诸凤娟，我院兼职研究员张炎兴，绍兴地方文史专家方俞明，柯桥区史志办主任何鸣雷，图书馆夏首磊，以及我研究院部分教师等。

陈君提出，越文化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从宋代的陈亮、吕祖谦，明代的王阳明，清初的刘宗周、黄宗羲，到近现代的鲁迅、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这些人在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对中国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此次调研希望能够对越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想通过实地探查，了解书院在浙东以及绍兴的文化发展中具体发挥何种作用。

方俞明概述了浙东学术发展史，指出经世致用、“接地气”是浙东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考察与研究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必须注意“外来者”的作用。例如吕祖

谦家族携来“中原文献”，分居金华、余姚、绍兴等地，影响深远；朱熹等外来文人学者来绍讲学，成为创办稽山书院的源头。这些都可以看到浙东学术、书院文化与中原以及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值得研究者重视。何鸣雷介绍了绍兴地区书院的概貌，认为在稽山、戴山等著名书院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小书院乃至精舍、义塾等，遍布在绍兴的城镇乡村。例如兰亭书院、安昌的朱氏义塾等。这些书院的遗存情况大多不太理想，但在历史文献中仍可爬梳出大量资料，有待细致深入研究。张炎兴介绍了自己在阳明学研究方面的心得，强调“宋明理学”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钱汝平介绍了绍兴碑刻的出版及研究情况。夏首磊也详细介绍了绍兴方志中对古代书院的记载情况。

社科院王宣标、胡琦、王霄蛟等几位青年教师聆听了专家发言之后，纷纷表示收获非常大。胡琦特意指出几位专家的想法与此次调研的初衷不谋而合，要把文学史、

思想史的发展等放在地域文化中，从一个接地气的角度来重新思考。通过以上几位专家的讲解，对绍兴古书院在越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大大小小的书院是如何运作的等问题的理解都变得更加生动。胡琦还表示，虽然目前看来记载书院的文献稍不足，若通过实地考察，能够找到一些遗存、碑刻等，一定会对理学家们的思想，或者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怎样进入到社会的中下层等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研究。

诸凤娟对座谈进行了总结，她认为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座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老师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关注地域文化研究，注重田野调查，这非常值得学习，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再结合文献，才能找到更多的创新点。她期待在本次座谈之后，大家还能有进一步的交流与沟通，也期待将来有科研项目上的合作。

(越文化)

## 新中国七十年与越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进一步梳理越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越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19 年 10 月 26 日，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承办了新中国七十年与越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在绍兴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陕西、广西、浙江等国内多个省市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回顾了新中国七十年越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并就新时代越文化研究及建设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

在大会专家报告环节中，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廖可斌先生作《越文化视野中的浙东文学研究——以明代文学为中心》的报告。廖可斌认为，在明代文学史上，浙东文学家虽未出现全国性的文坛领袖，但从一流文学家的标准来衡量，浙东至少也有宋濂、徐渭、张岱三位。宋濂“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徐渭反对台阁体与复古派的创作主张、张岱抒发性灵的小品文创作，都对明代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廖可斌还通过具体的例子，精辟地指出明代浙东文学家身上所

具有的“坚持自我，不与人同”“执着理想，至死靡它”的人格特点。这些人格特点扎根于越地文化土壤，是越地文化发育出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廖可斌还客观分析了浙东在全国文坛中的“次中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浙东文学家的“次中心”心态，这种心态使得浙东文学家在“坚持自我，不与人同”“执着理想，至死靡它”的人格优点之外，同时也产生了过于激烈、缺乏格局的某些缺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先生作《徽文化与越文化之关联与差异》的报告。朱万曙从地域文化研究的比较视野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徽文化和越文化在地理区位上的关联，徽商正是通过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水路走出徽州，分布在越地的角落角落，从事商业经营及各种文化活动，因而徽文化与越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融合，但是徽人与越人在文化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的。这个差异存在历史地理原因，徽州处于万山之中，少受战乱影响，因而产生了讲求稳定的平和和守正的意识，更多的沾染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地多为平原，常受战乱之苦，因而越人多有求新求变的意识，少受儒家思想薰染，而多慷慨多识之士。两者各有利弊，徽文化平和守正但缺乏创新的驱动力，越文化讲究思想创造和坚守但似过于决绝激烈。今人应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取长补短，把文化自信落到实处。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陈立旭教授作《浙江现象与浙江精神》的报告。陈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全国中下游水平跃居全面前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民营经济唱主角，以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专业化特色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浙江现象”。“浙江现象”的背后是“浙江精神”的促动，正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和“求真务实

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创造了浙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陈立旭还对学界总结的间接促成“浙江现象”的背后历史文化因素诸如南宋陈亮学派重实利思想的影响和悠久的工商传统的承继等提出质疑，因为南宋以来对浙东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并非陈亮，而是朱熹；至于工商传统，晋商、徽商比浙商历史更悠久，影响更大，所以对间接促成“浙江现象”背后的传统文化因素还需更深入的探索。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王阳明研究专家钱明先生作《阳明心学中的史学化现象——越州王门张元忭的思想与著述》的报告。钱先生指出，张元忭作为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一直很低，远不如对其曾孙张岱的关注度，但是张元忭在对阳明心学的纠偏以及为浙中王门心学史学化上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阳明学的早期形成阶段，由于有徐爱的存在，浙中王学未出现“偏离”，但到了晚期发展阶段，由于有王畿等人的存在，使浙中王学出现了被许多王门弟子视为“虚妄”、“狂禅”的方向性“偏离”，于是便有了钱德洪、季本、孙应奎、程松溪、张元忭（下转第 6 版）

# 关于绍兴越剧文化特色产业的研究

●蔡 彦

越剧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风格。无论从外在的服装、饰品、人物形象，到内在的故事和表演形式，越剧都具有开发的价值和意义。传承发展越剧需要做好守护、创新、产业三篇文章。

## 一、珍视历史，守护文化传统

### （一）绍兴是著名的戏曲之乡

绍兴戏曲传统绵长，拥有越剧、绍剧、绍兴鹦哥戏、新昌调控、诸暨乱弹五大剧种和绍兴莲花落、平湖调、宣卷、落地唱书、绍兴词调五大曲种，声腔、唱调丰富，剧作、名家辈出，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越剧起源于绍兴。清咸丰、同治间（1851-1874），嵊州“落地唱书”兴起，其表演原由一半是农民一半是艺术家的男性农民来担纲，不久出现了女子越剧，清末衍化为小歌班，民国初发展为绍兴文戏。此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越剧的演出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首先是在内容上，越来越丰富多彩；在唱腔上，摒弃了原来明快跳跃的主腔，形成了柔美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为流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表演上，越剧更倾向于对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动的描写，并且学习其他剧种如昆剧、京剧等舞蹈，使越剧逐渐形成了写意兼写实相结合的风格；而在舞台上，通过对布景、灯光、音响、化妆和服饰的创新，使得越剧在舞台整体效果上更有立体感和形象性，这被称为“新越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剧成为我国第二剧种。

### （二）实施越剧文化生态保护

2016年，在越剧诞生110周年之际，浙江省文化厅在嵊州试点设立越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保护区内，所有以嵊州方言为基础、与越剧相关的文化遗产都属于保护范畴。今绍兴市境内越剧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以古戏台为例，据2016年绍兴市文广局组织调查：全市现存戏台554座。其中越城区32座，柯桥区78座，上虞区33座，诸暨市53座，嵊州市214座，新昌县154座。

实施越剧文化生态保护的重点是推进对越剧诞生地东王村、女子越剧诞生地施家岙、古戏台、越剧文物、越剧文献、越乡民俗等越剧文化遗产点保护，发挥乡村振兴作用。筹办越剧论坛，出版越剧图录、越剧丛书，以全面、完整地揭示越剧发生发展的文化环境与艺术特色。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越剧文化标识，在主要道路、商业街区、历史街区、演艺场馆构建立体式越剧宣传线。推动“越剧进校园”和越剧小梅花培养工程，加强对越剧传播区域方言的研究。如嵊州市在全县4年级学生中开设越剧课。制订出台越剧考核（级）中考加分政策。《我爱越剧》《越乡越韵律》通过浙江省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被列入全省地方课程教材。柯桥区钱清中学开设《越剧入门与赏析》《越

剧与中外文学》选修课。从1991年起，全市一些大中小学建立若干校内越剧社团，它们大部分建在小学内，学生自编自演越剧。

新时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视频、音频、直播、点播等多种形式，通过越剧网络传播平台作用，对越剧文化生态的保护空间也越来越广。2015-2017年，嵊州越剧艺术学校共举办10期微信课堂，接受国内外越剧迷6000人报名。2018年10月11日至14日，我市在城市广场会展中心举办以“文产融合·集聚共享”为主题越剧文化产业展。参与展览的戏曲服饰、盔头、乐器、道具脸谱生产企业既实体推介，又兼作电商。参展企业云艺社是一家以“互联网+”形式，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提供在线直播、在线教学、越剧文物以及私人订制服务的文化创新类企业。已注册会员25万人，累计服务越剧迷504463人次。2018年起，嵊州市将越剧传承创新基金提高到700万元/年。

### （三）推进团、校、馆之间互联，增强越剧专业力量

组建全市性越剧艺术研究院，对各越剧团、学校、博物馆等单位力量进行统一规划，统筹越剧演出、研究、教学等工作。提升绍兴艺术学校、嵊州越剧艺术学校办学档次，开办越剧本科班，争取在绍兴高校新设越剧专业。每年安排一定名额招录优秀越剧毕业生，享受引进人才的住房补贴等政策。通过承办中国越剧节，设立越剧名家名师工作室，推出优秀青年演员培养项目，助力越剧人才成长。

### （四）借力借势，形成一盘棋

把越剧种种散落于民间、存活在百姓记忆中的“活态”资源挖掘出来，形成一个个特色项目。如开设越剧唱腔、身段的社會课程。在大中小学建立越剧民乐团，所需的乐手均由学生担任。让越剧“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不仅丰富校园生活，也让年轻观众领略越剧艺术的魅力。同时,设置越剧发展议事协调机构和艺术委员会，实现推动产业发展与地方特色文化、美丽乡村、五星达标3A创建相互嫁接。

## 二、支持创新，探索传承发展新途径

### （一）是坚持打造“立得住、叫得响”文化品牌

在“和而不同”中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越剧创新要在立足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切忌哪个流行上哪个。若是把越剧中的文化遗产和地方特色丢掉了，那就失去了越剧的灵魂。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挖掘和弘扬越剧艺术中蕴含的核心思想、中华美德，凸显绍兴文脉、绍兴元素，在“和而不同”中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鼓励创作精品，鼓励参加国家级评奖、文化交流，力争每年产生几部大戏、电影电视，打响“绍兴越剧”品牌。利用分布全市1200余处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设施

举办传习和演出活动，夯实越剧基础。

一是在表演传承上，坚持戏以人传、人以戏传原则。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先后有吴凤花、陈飞、吴素英、张琳等演员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二是在剧目创作上，由绍兴小百花创排的新编越剧《屈原》《王阳明》，因浓浓家国情怀、正能量，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扶持项目，分别在国家大剧院、第四届中国越剧节和第十二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尝试投拍电影，在产业拓展上迈了一大步。三是在产业推广上，绍兴市演出有限公司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巡演列入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传播交流资助项目。从五光十色的大城市到演出条件简陋的农村市场，绍兴越剧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场场不落。越剧的内容和形式要快起来。

越剧要改变“慢”形象，创造更多让年轻人了解的机会。如组织排演“年轻”戏，把主创人员确定为80后、90后，演员确定为90后，是不是更易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 （二）坚持戏是唱给人听，观众愿意看、演员有收入、剧团能运营，越剧才更有生命力，这才是最好的传承

#### 1.完善演出单位体制机制

尝试股权激励，筹组院线集团，提高演出积极性。通过建立政府采购、项目扶持、场次补贴等财政投入机制，开展越剧巡演、越剧走亲等活动，有效扩大越剧影响力。如嵊州市越剧团“越乡越韵越剧万里行”，赴南宁、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合肥、西安、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石家庄16个省会城市巡演。绍兴市演出公司“越乡莲歌大舞台”、“越剧明星版巡演”等

#### 2.建立越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在适当的地理范围形成越剧演艺集聚区。发挥民营剧团作用，促进越剧集聚发展。这个集聚区可以在绍兴市域，也可以在市外、国外。

2012年，全市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其中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嵊州越剧团划转为公益性保护传承机构，诸暨越剧团、上虞越剧团转制为企业。2016年，绍兴市开展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全市登记注册的国办戏曲团体、民营戏曲团体、班社计195个，其中前述4个国办越剧演出团体的年演出收入约2000万，平均占年总收入的20%，最高的达43%，演出积极性较高。

2005年底，嵊州市共有112个民营越剧团，从业人员4200余人，全年演出35800场左右，年收入8000万元。当年，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省委书记习近平等领导相继对嵊州民营剧团产业化发展做法作出肯定批示。受此带动，到2018年，绍兴全市约有民营越剧团200余个，从业人员

5800余人，全年演出3万余场，年收入2亿元左右，成为越剧传承发展、繁荣文化市场的一支生力军。研究骨干剧团认定办法，支持一批实力、活力兼备，走出去意愿强烈民营剧团，实施“一团一策”，在政府采购、政策配套、资金投入上给予补助。支持跨地区、跨领域、跨所有制剧团间兼并重组，进而“小升规、规改股”，符合条件的骨干剧团能够上市。鼓励通过收购、控股、参股、联合等形式组建越剧演艺集团。

## 三、活化创新，促进越剧产业发展

### （一）对越剧服饰的开发

越剧服饰以淡雅、简洁、清新为特点，在图案的装饰上，多采用民间的吉祥图画和老百姓脍炙人口的形象，如日、月、星、梅、兰、竹、菊、龙、凤、狮、麒麟等，这些图案、颜色不仅能够衬托人物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拥有较多可提取的设计元素。

在嵊州黄泽，民间具有制作戏服传统。它们利用靠近柯桥中国轻纺城布料采购优势和当地传统制作技艺，将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2011年，戏服的生产和销售成为全市“块状经济”的样板。黄泽渔溪村建成6000平方米的戏剧服装个私集聚区，发展全国性戏剧服装生产销售中心，每年销售额已超过1000万元。到2018有18家戏服戏具加工企业落户该集聚区。

在利用现有的产业园，提档升级，促进戏剧服装规模化生产外，应当继续延伸开发。将越剧服装中的元素，如颜色、样式、图案加以提炼，与日常的服装相结合，年轻人通过穿着这一类服饰，增加与越剧元素的接触机会，从而提升对越剧的感性认识。通过将越剧元素加入到日常用品中，如越剧纹饰的头针等，增加越剧与受众的接触机会，在取得经济收益的同时推广了越剧文化。

### （二）对于越剧人物形象的开发

人物形象是越剧产业开发的一个重要资源。越剧剧目众多，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数不胜数，国际文化产业中不乏以形象为基础，开发产业链的例子。如Hello Kitty作为家喻户晓的卡通形象，仅仅用一只猫咪的形象，衍生出一系列的产品，包括服装、手表、玩偶甚至主题公园。越剧人物形象的开发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如将越剧的行当——小生、小旦、老生、小丑，制成相应的玩偶、日常生活用品等。

### （三）对越剧剧目的开发

越剧拥有大量的剧目，几乎每一出戏都在讲述一个优美的故事。《哈利·波特》在小说内容的基础上拍摄电影，根据小说建立主题公园，不仅有整体的主题公园，（下转第8版）

（上接第5版）等浙中王门诸子从各自立场出发加以“纠偏”的种种论说。在这些人物中，张元忬的地位十分特殊，他既与王畿、徐渭等人保持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又是“内部纠偏”的主要干将，为浙中王门心学学术化的价值取向及形态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分广义越文化研究和越地名人研究两个分会场进行讨论。广义越文化研究分论坛涉及越文化的各个面向，既有对个案的深入剖析，又有对宏观主题的把握；既有对越地古代文献的细致探讨，又有对当代越地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孙津教授对越文化在当今的形态变化及其意义作了说明。他说，当代越文化的基本形态已经或正在发生三个主要的变化，即由特定文化变为各种历史研究、由封闭文化变为对风俗的支持和说明以及试图由开放的遗产变为竞争优势的努力。从理论上讲，这些变化表明的是地方文化真实存在的普遍性及其相应主题的特殊性。绍兴文理学院俞志慧教授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和吉金文中有关越王世子的各种名谓，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十二种称谓都指向句践世子。“者旨”为其氏，又作“诸稽”“柸稽”，疾言之则曰“适”、曰“𪔐”；“于赐”为其名，又作“与夷”，疾言之则曰“郢”、曰“与”。绍兴文理学院余德余教授总结了自己从事越文化研究四十年的心得和体会。他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以下方面：一、绍兴文人雅集与结社；二、越中曲派；三、山阴州山吴氏家族；四张岱；五、杨维桢与《水浒传》；六、域外文化名人与绍兴。绍兴文理学院汪柏江教授对在绍兴的一次阳明后学弘杨阳明学说的极有意义和深度的事件“龙南夜话”进行了深度的挖掘。龙南庵由王阳明佛门弟子玉芝法聚所建。从玉芝法聚与王阳明、季本、王畿、徐渭等在龙南庵的交往以及王畿与张元忬、邓以赞、罗万化的“龙南夜话”等诸多事迹中，可证良知之旨“与禅理不殊”，也即儒释大同，此理即便在当下，亦有其非凡的现实意义。浙江传媒学院黄义枢副教授对清代的“名贤生日祭”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名贤生日祭”是在已故名贤生日由文人

举办的崇祀活动。这种文人雅集产生于清代并广为传播，是一种挖掘、宣扬地方名贤的手段。绍兴文理学院刘磊博士着重考察了“兰亭论辨”史上有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兰亭论辨”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重要文化事件，正是中国近60年来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感受到时代学风和社会观念的变迁。绍兴文理学院钟小安副教授主要解析了绍兴师爷文化内核与胆创精神的内在联系。他指出，绍兴师爷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文化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师爷文化的内核是胆创精神，绍兴师爷传承了越文化的内核，因而达到了传统幕府智库的顶峰。宁波海关胡丕阳先生主要谈了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眼光。越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我们在传承越文化的同时，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以创新的精神，弘扬越文化，使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当代价值。绍兴图书馆蔡彦研究馆员对绍兴的越剧文化特色产业进行了考察。他着重点出，越剧作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风格，无论从外在的服装、饰品、人物形象，还是到内在的故事和表演形式，都具有开发的价值和意义。传承发展越剧需要做好守护、创新、产业三篇文章。绍兴文理学院魏建钢副教授就越窑制瓷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与学界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他认为，越窑制瓷业突然失去地方政府保护、窑场因没有贡瓷生产而出现无序竞争、发达的越地农业挤兑制瓷手工业的发展空间这三个因素是导致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绍兴市文广局马峰燕博士从文物管理者的角度谈了对绍兴著名古桥广宁桥的观感。绍兴是著名的桥乡，广宁桥作为绍兴古桥的代表，充分体现了它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柯桥区史志办何鸣雷先生从古籍中搜罗出大量有关大禹的文献，并对其综合归纳，勾画出了大禹丰富而多面的立体形象。绍兴文理学院石峻华女士在整理点校天一阁所藏清代孤本稿本《六陵劫余志》后，对该书的作者、价值和缺点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绍兴文理学院周聚杰先生运用

实地考察与文献阅读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对《国语·越语上》所记的“甬句东”的地理位置作了详细考索。

在越地名人研究分论坛讨论中，专家聚焦于越地的多个标志性人物如范蠡、王冕、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范文澜、冯契、刘文西等的探讨。这很好地体现了绍兴作为名士之乡的地域文化特征。绍兴市范蠡研究会金华锋先生从如何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名人资源的角度，以范蠡研究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地方名人的研究要顺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方俞明先生详细考察了王冕《竹斋诗集》的版本。明代以降，王冕《竹斋诗集》版本之流传与演变极为复杂，厘清各版本之成书原委、文本差异和流变过程，对王冕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余姚市东海研究院华建新副教授以越中王门弟子为例考索了越文化视域下明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的过程。嘉靖初年越中阳明心学的勃兴与流播，受到越文化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孝道、易道与土道观念成为滋养阳明心学的肥沃土壤。浙江师范大学卢雨笛女士对明末清初的海宁籍戏曲家陈之伸的生平和著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越秀外国语学院王英副教授以越地士人黄宗羲为中心考察了时代变局中士大夫身边的“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指儒家士大夫主导的传统伦理规范，“小传统”是指民间的佛道神士信仰。王女士认为，明清之际儒家士大夫主导的“大传统”与其身边的“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定的独特性。绍兴文理学院田义勇教授从“异在论”角度对王国维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审美价值讲，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这是“异阶间性”问题。从“以物观物”异于“以我观物”的方法论讲，这是“异类间性”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面对“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异”，“存异”还是“灭异”？王国维在“存异”而求“两全”与“灭异”而臻“玄同”之间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存在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

情形。绍兴文理学院马芳芬副教授从考察蔡元培的诗歌创作和诗序诗评入手，讨论了蔡元培的诗学观。她认为，“诗人之诗”是蔡元培追求的诗学理想，“诗”中有“学”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绍兴市台办何有基先生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40年代、80年代台湾掀起的三次“鲁迅热”。虽然这三次“鲁迅热”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足证鲁迅的文学作品在台湾的巨大影响力。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副教授从当代立场出发，将鲁迅定位为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承传者和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来源者。鲁迅出生于绍兴，深受浙江悠久历史文化的滋养和影响，是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承传者。鲁迅致力于“立人”思想探索和“国民性”改造实践，其精神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绍兴文理学院苏冉女士则分析了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伤逝》的结构特点。绍兴文理学院胡雪盼女士则对周作人通俗文学观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作了揭示。孔子研究院路则权副研究员则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例，揭橥了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梧州学院张朝松副教授对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契的儒学观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冯契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已达到了“世界哲学”的理论深度。西安美术学院武凤珍教授描述了当代黄土画派大师刘文西的黄土文化情结。她认为，刘文西的艺术创造深刻影响着21世纪初的中国画坛。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来自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大家汇聚在一起，就广义越文化及越地名人等议题展开热烈而融洽的研讨。研讨充分展现了学者们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创新意识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不忘初心使命，进一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的举措，必将对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越文化）

# 王冕《竹斋诗集》版本考

●方俞明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会稽外史。浙江诸暨人。他曾著述《栗里稿》若干卷。存稿于家，易代多损，后人辑刊为《竹斋诗集》。所谓“竹斋”者，元章诸暨之草庐，亦元章读书之所也。

王冕为人狂放，其诗亦豪放不羁。宋濂赞其诗曰：“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刘基序其集曰：“予尽观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惓惓，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魏骥誉其诗曰：“大篇短章，英雄俊伟，汪洋浩瀚，酷似其为人。”《四库总目提要》评曰：“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忧解难性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翁方纲《石洲诗话》更独赞其作为画家之诗：“元时诸画家诗，如云林、大痴、仲圭集中，多属题画之作。云林最有清韵，而尚不能剔去金粉。至王元章，纯是十指清气皴拂而成，如冷泉漱石，自成湍激。”

王冕著述，原有总名曰《栗里稿》。“栗里”典出陶潜，为渊明先生故居地，现存《竹斋诗集》卷上“偶成七首”之一曰：“人言栗里是吾家，问信东皋事已讹。”此中“栗里”“东皋”皆为用典，“栗里”出渊明，“东皋”出阮籍，皆喻隐居也。品读《偶成七首》，多能咀其隐意，其中数首意境，正合元章晚年隐居会稽九里山之心境。称王冕此稿曰“本其故里”，即由此典衍生。盖王冕著述本多，易代之际，屢遭兵燹，致遗稿多有残损，今所传止诗集耳。其早期刊刻传钞之本，皆曰《竹斋诗集》，至乾隆间官修《四库全书》，因与南宋诗人裘万顷诗集重名，而改名为《竹斋集》。现存四库全书本《竹斋集》之续集卷首有跋曰：

按是稿初分为四，遭失殆半。七言律诗，山樵记謄，默为手书。五言绝、七言绝一无从考。于梅之品题，常多传入画中，故不录。好事者传诵不少置，因举一二，备夫缺略。沧海遗珠，光彩终焉呈露，适尔全稿可致，当采而补入。《塘堦暨阳骆居安等敬书。

山樵为冕子王周之号，由跋文可知，王冕原稿传至王周手上已经缺损。王周整理先父诗集存稿，并部分默写补缺，手录鉴定，初分为四，此为《竹斋诗集》定稿之始。

而《竹斋诗集》之刊刻，首在明景泰中。白圭《书竹斋先生诗集卷后》详述此次刻书原委：

是集之传，实先生曾孙婿骆大年之所自也。大年端介愿忠，儒素自居，云栖乃别号。如王，字永贞，从大父山樵翁，异而命之壺彝，素率配德，警诫无违。子三人，长居安，次居敬、居恭，闲习诗礼，雅雅气谊之间，居敬梅之墨妙亦精。其尊人溪园先生，博学擅古文辞，山樵为志年长，遭稿刊刻，深切于衷。溪园尝输粟贷贫民，奉旨以义民旌叙，预光禄酒饌，采辑《诸暨志》，工费毋涸于人。书成，大家贲见，具醴醑，悉拒绝之，谓介若是，非义而何逮？若如王，保佑其家世，其竹斋遗稿，辅相克观厥成，行无攸遂，宾敬有仪，重山樵十年，乃字之得人。竹斋襟怀旷绝，矫时慢物，尝曰：士生天地间，苟不以道德功名显，亦当文翰传后，何得生无益而歿无闻焉？诸孙武昭，克能佩服斯训，凡诸述作，无不记忆。叩之，朗然成诵，慨古怀今，萧然吟咏自若，明日辄无粟煮，不暇论。事殊世异，几及百年，云栖相谓，兴起休烈，导扬篇简，具载刊置，九原可作，平生志愿酬矣。德功夙刻，措诸言辞之表，人得而见之。诗凡三卷，弁诸首简，诚意伯青田刘公基；出处详悉，并载太史金华宋公濂、训导诸暨张公辰《传》中。予也，与王氏居连里巷，山樵为执友行，侍席听讲常多，重以溪园文学交好，斯金之谊，姻亲之往，详于见闻，高山仰止。书成，涣乎一新，因不辞而书之。《诗》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其斯之谓乎！景泰七年岁在丙子二月既望郡人白圭书。

骆家贤，字则民，号溪园，诸暨枫桥人。生性好学，德行高洁。筑溪园于枫溪之上，藏书盈屋，学者尊为溪园先生。岁饥，出稻谷千石以赈。明正统年间，诏旌其门曰“尚义”，敕建“尚义坊”。编纂景泰《诸暨县志》。有《溪园遗稿》存世。溪园子骆大年为王冕曾孙女婿，同溪园孙骆居安、骆居敬、骆居恭，三代共举刊刻王冕遗著《竹斋诗集》事，刻竣，已在景泰七年（1456）矣。书后有骆居安兄弟跋：

居安等谨按：外高祖山农先生抗志为儒，怀奇异；一亩之宅，清约自处，集义养浩，声利一无动于心。具载《传》《序》中。吾母性至孝，尝抚谕我兄弟曰：我先世竹斋遗稿当时未能问世，必付之梨枣以酬我祖、父志，岁月于迈，因循恐无及矣。幸我堂上垂白之祖，昔曾亲炙我外曾祖山樵先生，推及是心，为之申命于下。吾父乃命居安日于诸弟居敬、居恭校录，阅数月始得编纂成秩。伏念居安等学植荒落，不获扬名显亲，无从效昔人成其宅相之荣。兹仅从事分枝，以聊慰吾母不匮之孝思，已滋愧矣，敢云有功于是集者？外家五世孙居安居敬居恭同拜谨志。

此跋与白圭一文，可互参是书刊刻原委。值得一提的是：《竹斋诗集》最初由王周雋订

存稿，至王冕曾孙女婿枫溪骆大年及其子骆居安、骆居敬、骆居恭首次整理刊刻时，原本惜厄兵燹，煨烬残缺已遭损殆半，于是重编为三卷，又搜罗补辑成续集一卷。是为《竹斋诗集》之景泰七年枫溪骆氏刻本。此刻本今已无存。

《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经籍志》卷四十九收录“竹斋集三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条曰：“焦竑《国史经籍志》所著录仅二卷，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旧钞本作三卷无续集……杭州振绮堂汪氏有明钞本不著卷数，许氏有精钞一册，大抵皆从枫桥骆氏所刻传钞而各有删节，《四库全书提要》所收则删刻原书也。”又曰：“冕歿后稿多散失，其子王周山樵氏辑其存稿藏于家，周之孙女王永贞抱此稿以归枫桥骆氏，命其子骆居安居敬居再蒐辑杂文，合校付刊，而王永贞手为点勘，后附明吕升所撰王周行状，卷首题曰‘曾孙女婿骆大年辑’。大年名矜（俞明按：铁琴铜剑楼藏旧钞本，骆大年之名亦作矜，而当代通行传本作‘大年名 穉’。考其字义，当以‘矜’字为是），永贞婿也。永贞既与诸子校刊此集，而归善于矜也。”则此条崎园老人修志所述王永贞参与《竹斋诗集》校刊之事迹，又别有新意矣。

至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陆续征书采进，王冕诗集即据两淮盐政采进本入编，列《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二十二。全书正集三卷续集一卷，后分钞七部，藏于四库七阁。《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之《竹斋集》条曰：

臣等谨按，《竹斋集》三卷《续集》一卷，明王冕撰。冕字元章，《续高士传》作字元肃。诸暨人。本农家子，家贫，依沙门以居，夜潜坐佛膝上映火读书。后受业于安阳韩性，遂传其学。然行多诡激，颇近于狂。著作郎李孝光、秘书卿泰哈布哈皆尝荐于朝。知元室将乱，辞不就。明太祖下婺州，闻其名，物色得之，授咨议参军，未几卒。宋濂为作传，载《潜溪集》中，叙其末几甚备。《续高士传》以为太祖欲授以参军，一夕卒。《浙江通志》据以列入“隐逸传”。旧本亦题为元人，非其实矣。诗集三卷，其子周所辑，刘基序之。续集诗及杂文一卷，又附录吕升所为王周行状，则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忧解难性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集中无绝句，惟画梅乃以绝句题之。续集所收皆自题画梅诗也。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竹斋集》提要言简意赅，传出翁覃溪同学手。然白璧微瑕，也略有小误，如“诗集三卷，其子周所辑”，实则王周默写补缺，手录厘定之《竹斋集》原本为四卷，因“遭损殆半”，骆氏首刻时重编为三卷。“则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女孙即孙女，王永贞实为冕曾孙女，提要此处行辈有误。

当代常见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渊阁本《竹斋集》之影印本。半框八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是为《竹斋集》之四库全书本。

嘉庆初年，王冕后裔诸暨王佩兰得鲍泳饮襄助，以鲍氏知不足斋所藏《竹斋诗集》旧钞本录副为底本，汇辑校织，雋为四卷，以家刻本重刊于诸暨。是本半框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扉页有署记三行，右表作者“王元章先生著”，中署大字隶书名“竹斋诗集”，左落藏板堂号“安雅堂藏板”。安雅堂为暨邑王佩兰斋号，王氏《竹斋诗集》刊竣于嘉庆三年（1798）十月。是为嘉庆三年暨阳王氏安雅堂刻本。安雅堂本之版本演变最为复杂，至今学界对该版本的表述似未尽其详。

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三年安雅堂刻本《竹斋诗集》四卷，卷末有暨阳王佩兰跋，曰：

《竹斋诗集》向分四卷，先生之子山樵先生所手录、曾孙婿骆大年所编定，古歆鲍泳饮藏本也。传钞既久，伪舛滋多，好古之士咸用惘惋。因请朱青湖汪君泂加勘校，复质之鲍泳饮、戴鉴溪、郭春林、张企晋诸君子，始成善本。先生诗草经路氏纂辑后，相去已数百年，犹得流传至今，重藉订定，是皆其精英结撰，卓杰今古，有历久而不可磨灭者。佩兰自揣微末，不克绍先世遗业，睹兹卷帙，弓冶斯贻，政不独珠玉杯，惶惶家史已也。爰付梨枣，以广其传，并缀始末于后。时嘉庆三年戊午冬十月既望暨阳后裔佩兰谨识。

读跋文可知，安雅堂本原刻初印于嘉庆三年（1798）十月。跋中四个人名与该版本关系重大：一是鲍泳饮，即清代大藏书家鲍廷博，字以文，号泳饮。祖籍安徽歙县长塘，随父鲍思湖居杭州。家世经商，殷富好文，不求仕进，喜购藏秘籍。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共征书3503种，延博长子鲍士恭以所藏精本626种进呈，居私家进书之首，知不足斋以藏书刻书名扬天下。鲍泳饮为安雅堂刻本《竹斋诗集》底本提供者 and 校勘者。二是朱青湖，即钱塘名诗人朱彭，字亦筏，号青湖。谙熟杭州掌故，潜心著述，好学能诗，时有“独倡唐音”之说。朱氏为刻书样稿的主要校勘者，并为该版本初刻撰写序言，《序》曰：“诸暨王君柱公，好古者也，因购书侨居杭州。一日过余抱山堂，手一编请曰：此予家

远祖竹斋《集》也，访求数载，今得骆氏本于鲍氏知不足斋，然中多鲁鱼亥豕之讹，幸为我勘校编次之，且乞一言弁其首，将付之梓人以传世焉。”朱氏《序》年款落“嘉庆三年岁次戊午十月”，年月同王佩兰跋。三是王佩兰，字者香，号柱公。诸暨人，王冕后裔。喜购书。余不详。王氏为该版本刊刻主持者。四是郭春林，即诗人郭毓，字又春，一字春林，号紫石山人。其里籍为诸暨郭店，与王冕故乡栢江毗连。郭氏为诸暨名诗人，天资颖悟，奈世运不济，仅以诸生终老，然一生好学不倦。平生游幕豫、湘、楚、闽凡数十年，足迹几半天下，所历名山大川、古迹胜景，即慷慨发之诗歌。歌咏之暇，心切桑梓。郭氏既是重刻《竹斋诗集》的最初谋划者，又是安雅堂本后续之重加校勘、修订增补者，缘郭氏之校订补《序》，而使安雅堂本出现了与嘉庆三年原刻本面貌迥异之嘉庆四年修订本。

嘉庆三年（1798）岁末，郭春林辞幕里居。至次年七月，始得读王佩兰安雅堂本《竹斋诗集》新刻书，并覆校之。因郭、王有刻书前缘，郭氏复受王佩兰之请，撰序详述刻书之缘起，时在嘉庆四年八月。郭氏《序》文，言真而意切：

乾隆壬寅之秋，予客杭，寓居姚园寺巷姚氏之双清轩，与鲍子以文相往来，一日，读元人诗而鲍子适至，因语之曰：“吾乡杨铁崖、王山农二公，诗文甲于元代，而集鲜完本，君家饶秘笈，盍以其全者示我乎？”鲍子曰：“具有之，王一而杨七，皆足本也，予欲见之，夫何吝！”予跃然起曰：“此事怀之久矣，君果以足本相假，当谋之邑中，合众力为重梓焉。”鲍子许诺，且从而怂恿之。是夕酒酣，予濡笔作《征刻启稿》一通，凡数百言，方欲举行，为友人率率入闾，事遂寝。越十有六年为嘉庆丁巳，与王君柱公晤，言及之，君大喜曰：“不才亦怀之数年，鲍氏本近已借录，藏篋中，正欲待先生为提唱耳！”即持《启稿》去，锲而传布之，然同人应之者尚少。逾年自客所归，有告者曰：“柱公刻《竹斋集》将竣事。”予心喜之而未遽信也。今七月之二十有二日，既人定矣，有叩门送书者自城中来，启视之，则涣然《竹斋》新刻也，为之狂喜。时秋暑方盛，篝灯而疾读之，不自知蚊蠅之刺肤，与沾汗之流足也。柱公书来，嘱予覆校，为考定伪谬数十字，题四诗于卷以复之。近又力督为序，予告以山农先生之为人与其诗，有刘文成公《序》知之深、论之当，予何人，敢复贅为？辞不获命，故追述其刻书之缘起如此。噫！是役也，虽发端于予，而劳苦奔走，力与愿违。今得山农后裔割赐告备，诚为可幸矣。然而蓬蓬流转之身，无风穹唱和之实，斯幸也！适足以愧也。柱公方切切焉，为铁崖七集呼将伯，吾知自今以往，人皆感柱公之用心，慕表章前哲之盛举，山鸣而钟应，磁引而铁随，必能期集事于予，又将转愧而为幸，且得藉手以告成事于鲍子，其为幸更何如也！嘉庆四年己未八中秋日，同里后学郭毓书。

嘉庆四年安雅堂修订本，除了校正嘉庆三年本数十字之伪谬外，还增刻了上面这篇郭春林的《序》，以及更换了一篇措辞大异于三年本的王佩兰后跋，《跋》曰：

《竹斋集》四卷，元季吾家远祖元章先生所著诗也。明正统间，其曾孙婿骆君大年取其妇王氏永贞奩中藏稿为之编次，镂板以行，今骆本不复存矣。丙辰春，居武林，始获写本于鲍氏知不足斋，传钞既久，舛伪滋甚，固商正于朱青湖、戴鉴溪、张企晋诸君子，付之剞劂。刻既竣，郭君春林自建州归，再以所藏明陈章侯家旧钞本重加校勘，愈益完善。盖先生之歿去今四百四十余年，而遗诗仅一传刻，虽选家有采括，而全豹未窥，徒深慨想。佩兰不敏，勉为是举，公之于世，以副海内好古家愿见之怀，非谓江左诸王人人有集，以宗贤祖德厚自夸耀也，识者鉴诸。嘉庆四年己未秋八月上浣诸暨后裔佩兰谨识。

安雅堂本之版本演变，还不止于此。其后，经郭毓等潜心搜讨，得王冕佚诗七首，其中七言古诗一首、七言律诗三首、七言绝句三首，附于四卷之末，增刻为“补遗”卷，并搜辑得骆氏原刻本收录之张辰《王冕传》一篇，补刻于宋景濂、朱竹垞二《传》之先，郭毓并附小跋一篇于张辰《王冕传》后：

张辰字彦晖，孝子张万和后也。经术深茂。明初诸儒应聘而起，吾暨则陈嘉谟、张辰、陈韶入参史局，出树师模，彬彬盛矣，列《县志·文苑传》，并见《附志》。据此文，辰与元章先生友善，先生没，为作《传》。其后，宋景濂《传》《列朝小传》、朱氏《曝书亭集》所载《传》，皆蓝本于此，而以所传闻者点缀附益之，互有异同。然要当以此文为实录。今列于前，则受咨议参军之诬，不辨自明。并存宋、朱二《传》，使明者览之，知诸公滥觞所自，而宋《传》尤失实，竹垞先生之论，为稍持平也。春林郭毓识。

这二处内容的增刻，显然于文献大有裨益。其一，“补遗”之卷，增加了竹斋诗的数量，辑佚七首中的后三首，即《应教题梅》《题云峰上人墨梅图》《题巨然画》，大概辑自顾夔君《元诗选》二集之《竹斋集》。其二，

张辰之《传》及郭毓之跋，更丰富了王冕传记的原真性。增刻未知具体时间，我们姑且称其为安雅堂补遗本。郭毓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则安雅堂补遗本的增刻定本时间，必在此期以后。

至清光绪中期，邵武徐铤出资刻《邵武徐氏丛书》，再入《竹斋诗集》四卷于其中，史称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徐铤，字伯开，一字小勿，福建邵武人，清末学者，同治年间为国子监教习，后历官浙江上虞、嵊县知县。自光绪七年至光绪十四年，徐铤在前后八年时间内陆续主持刊刻《邵武徐氏丛书》共23种，《丛书》分初刻和二集，初刻15种86卷，二集8种64卷。其中，仅部分书有刻书牌记年款，而《竹斋诗集》四卷，则为无刻书牌记年款之书。故此版本的刊刻时间，只能粗定在光绪七年（1881）到光绪十四年这一区间范围内。徐氏本《竹斋诗集》，每半框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每叶书口下端偏右镌“邵武徐氏刊”题记一行。卷端刻“诸暨王冕元章著 邵武徐铤小勿校”署名两行。

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卷前仅有刘基《竹斋诗集原序》、嘉庆三年朱彭《竹斋集序》和嘉庆四年郭毓《竹斋集序》，无一后跋，入集诗文无“补遗”卷。由此可定：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的刻书底本，为“嘉庆四年安雅堂修订本”。盖其时安雅堂本尚未有“补遗”卷增入，致徐氏刻书亦付阙如。徐铤在付梓此书时，还选择性地删除了安雅堂本中的跋、传、记和《故山樵王先生行状》，而仅留序文三篇。令人疑惑的是，底本中作为“附文”的《梅先生传》，在原刻邵武徐氏丛书本中，却有目而无文。

为解读这一疑惑，蒙友人浙江图书馆文献专家陈谊博士襄助，比对多部印本，又欣喜发现了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的版本演变：浙江图书馆藏有另一部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为民国后印本，字口多有漫漶。书近终卷，却在卷四之后，发现了本来邵武徐氏原刻本有目无文的那篇《梅先生传》，细审其三个书叶，每叶书口下端皆镌有“民国六年浙江图书馆补刊”两行题记。经查证文献，知《邵武徐氏丛书》刻书板片，清季已整体转入浙江官书局，民初入浙江图书馆，至民国六年浙江图书馆重印时，补刻了《梅先生传》三叶书版，终使目录与正文名实相副。由此，又出现了一个邵武徐氏丛书本的演变版本，此本可称为：邵武徐氏丛书民国六年浙江图书馆补刻后印本《竹斋诗集》。

清季《邵武徐氏丛书》刻书板片在浙地的流转，引申我思考另一个问题：《邵武徐氏丛书》之刻书地点，也即邵武徐氏丛书本《竹斋诗集》的刻书地点。查考徐铤浙地为官行迹，有三条比较明确的史料，其一，被列为《邵武徐氏丛书》中最早刻本的《樵川二家诗》，刻书时间是光绪七年（1881），徐铤序文曰：“辛巳初夏，予卸上虞篆后，赋闲无事，取四家诗读之，觉《华谷》《樵水》二集，时代虽同，格律稍异，因刻入《昭阳扶雅集》中，而《樵川二家诗》仍复其旧，爰付手民，庶与《诗话》《秋声》二种并垂不朽。光绪七年闰七月邵武徐铤小勿氏序于杭州。”其二，《李鸿章全集·奏议九》有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浙江官绅劝办直赈请奖片》，事为：光绪六年，直隶被水成灾，工賑需款繁巨，不得已商恳东南各省量力集捐，浙江一省共计捐银十万两有零，现浙省捐款解清，自应将劝办出力人员择尤请奖。其请奖名单中，就有“教习知县徐铤……拟请加随带三级”内容。这两条史料说明：迟至在光绪七年（1881）初，徐铤已在浙省上虞县莅任知县之职。其三，武汉图书馆藏《清浙江秋闱硃卷》稿本一册，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浙江乡试硃卷，房号为“第拾貳房硃玖玖柒号”，册内第三场试卷上铃盖有多枚考试官戳记，其中一枚印文为：“掌卷所官补用同知前署嵊县知县徐铤”，这条史料说明：至光绪十七年秋，徐铤依然在浙省为官，且擢升为补用同知。而《邵武徐氏丛书》陆续刊刻于光绪七年至光绪十四年，此期正是徐铤浙省地方官任上，故《邵武徐氏丛书》刻于浙省，可为定论。细审《邵武徐氏丛书》子目，总23种书中，邵武历代名人著述6种，而浙江历代名人著述有8种，其中与绍兴府有关的名人著述最多，共6种，计：高似孙（鄞人 晚家于越）《剡录》十卷、王冕（诸暨人）《竹斋诗集》四卷、邵廷采（余姚人）《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王煦（上虞人）《小尔雅疏》八卷、支遁（流寓江南 隐居越地）《支遁集》二卷《补遗》一卷。此书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徐铤主持刻书时，遴选待刻文献的地域倾向性，由此也把刻书地点的区域圈定，更多指向郡城绍兴或省城杭州。前引《樵川二家诗序》，署款曰：“光绪七年闰七月邵武徐铤小勿氏序于杭州”，则丛书刊刻地，可基本确定为杭州，而指向杭州，更符合解释其后书板流归浙江官书局这一现象。

综上所述，自明、清而至民国，王冕《竹斋诗集》版本之流传与演变极为复杂，薈清各版本之成书原委、文本差异和流变过程，对研究先贤行迹、解读先贤诗文，皆意义重大。

# 周作人通俗文学观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胡雪盼

1932 年 2 月 19 日周作人在北大国文系作了题为《关于通俗文学》的讲演，同年三四月他又在辅仁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这两次讲演均提到了他对通俗文学的理解和关注，表达了他对通俗文学的一部分看法。在这两次讲演中他着重提到了通俗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没有对通俗文学的价值作进一步的阐释。但是他对通俗文学价值的看法其实断断续续出现在他其余的文章之中。他对通俗文学的理解不仅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时至今日仍对我们当代通俗文学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现在盛行的网络小说，是不是也应该纳入文学研究之中？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周作人在 1932 年的《关于通俗文学》中提出了文学应该分为三个部分，“文学的范围是很大的，可以分为三部分：即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纯文学。”并且指出了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二十年来，我们讲的是纯文学这一点，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统统放弃了。我们不当只注意这一小部分，我们应当将全部文学拿来看一看。”他更是前所未有的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影响力，“通俗文学不但可以表现国民性，它还可以表现一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通俗文学研究的重视，认为通俗文学可以表现“国民性”，这个范围是很大的。此外，他认为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小的，“纯文学是不能代表全民众的思想的，也没有什么大的力量。我向来主张文学无用与无效。老庄孔孟是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因此，我们亦可以说老子、孔子……对于中国亦无甚影响。至于通俗文学，民众读了，其思想自然会发生一种变化，所以当我们有深切的注意才好，这样，才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部分的思想来。”这种扬俗抑纯在当时是有独特的社会环境的，是要启发民智的时代，事实上通俗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紧接着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重申了这一观点，因和上次讲演时间相距不远，所以他的通俗文学影响的观点并无大的变动，但还是进一步阐释了通俗文学的定义，“通俗文学是比较原始文学进步一点的。它是受了纯文学的影响，由低级的文人写出来的，里边混杂了许多官僚和士大夫的升官发财的思想进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以及大鼓书曲本之类都是。现在的报纸上也还每天一段段的登载这种东西。”在这里他仍然没有对通俗文学进行细分，也没有对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进行阐述。不过他认为通俗文学的作者是“低级的文人”；文本思想里“混杂了许多官僚和士大夫的升官发财的思想”。从他所举的通俗文学的例子来看，其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以及大鼓书曲等，主要是古代通俗文学。现在被列为文学经典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周作人那里是归入“通俗文学”，但是现在俨然已经是经典文学。他又说“现在的报纸上也还每天一段段的登载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些连载的小说。可以说那时的报纸就如现在的互联网一样，是小说发表的载体，只不过略过了筛选这一过程，在当

代，读者成为主要的筛选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通俗文学的定义是比较宏观的，那时候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也被当做通俗文学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他没有再进一步的细分。由此可见周作人关于“通俗文学”这一概念也是比较宏观的，比较混沌一些。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所谓的“通俗文学”竟然变成了经典文学，成为文学史重要的一份子。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通俗文学”的重要作用。

周作人对通俗文学影响的关注，其实也是关注社会的一种表现。因为要想知道我们的社会，通俗文学无疑是较为重要的一条途径。他把文学研究拉回到通俗文学，给了通俗文学一点力量，而不是永远成为纯文学的比较和批评的对象。不管是在那时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太重视通俗文学。不管在哪一领域，都会存有一条歧视链。例如在电视剧方面，看英剧的瞧不上看美剧的；看美剧的瞧不上看日剧的；看日剧的瞧不上看韩剧的等等，以此类推。其实如果多方涉猎的人就会明白，各国电视剧各有特点，也皆有精品，这种歧视只不过是所谓的“优越感”在作祟。如果我们只一味地批判通俗文学缺点，而不肯对其加以研究，探讨其产生、影响等的原因，那我们对通俗文学的批判就没有说服力。而周作人对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的较少谈及，也与其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的看法有关。他更多是想提高通俗文学的研究地位，认为通俗文学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多的了解社会，对文学价值的看法则是不断发展的。

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不断发展的，他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的看法也是不断发展的。在他早期，即 1918 年那一时期，他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的批判可谓彻底，那时候他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建立在“人的文学”的基础上，因此几乎所有的通俗文学在他眼里都不合格，在他看来文学价值很低，“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只全一套板。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不管是现代被奉为经典的古代通俗小说还是清末的通俗小说，统统都是批判，总之是达不到理想中的文学，“所以做起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打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他。”“古旧的厉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更是可以看出他是对部分通俗文学作品中那些落后的、过时的思想的批判，是不符合他对文学的标准。

在 1918 年 12 月《人的文学》这一篇中，为了论证其论点，对通俗文学的批判更为彻底，“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以“人的文学”观点来看，他在《中国新闻学之源流》提出的《水浒传》《七侠五义》是“强盗书类”。其他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也都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但是他仍主张可以研究通

俗文学，“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这虽然没有说通俗文学的影响，但总还是认为可以研究。

随后，他又发表了《平民文学》，平民文学的提出应该是他对通俗文学的超越，希望可以产生出“平民文学”，其实是对通俗文学的改进。他指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提出了他的平民文学观。在这里，他仍然没有摆脱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较低的观点，只有《红楼梦》除外，这当然与他本人的欣赏有关，“被挤在文学外的章回小说几十种，虽是白话，却都含着游戏的夸张分子，也够不上这资格。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此书虽然被一班无聊文人学坏成了《玉梨魂》派的范本，但本来仍然是好。”《红楼梦》应该是周作人最喜欢的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他不止一次的在文章中对其赞美，“即使写得极好如《红楼梦》，也只可承认他是旧小说的佳作”。《红楼梦》和《玉梨魂》派的对比，说明通俗文学其实也分为文学价值较高和较低两类，通俗文学中也是有佳作的。只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周作人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的判断，他是以先进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待中国通俗文学，自然可以发现其中落后的因素。

周作人于 1922 年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这是他文学观转折的重要标志。他开始真正重新审视通俗文学里的思想观念，认为这只是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应该宽容。“以为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精神，但只是对于人生的两样态度，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他的分布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这便是这两个名称的来源。”可以看出他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评判主要从通俗文学文学思想方面，“但在《留东外史》，其价值本来只与《九尾龟》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所以他从文学思想来看，“《留东外史》终是一部‘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

而他通过通俗文学文学思想来判断文学价值的方法，虽略为简单却不失为较好的分辨方式。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他的文学观不断发展，他也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等通俗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西游记》《封神传》以及别的荒唐的话（无聊的模拟除外），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但是对于《九尾龟》之类的作品，不管是《玉梨魂》派还是鸳鸯胡蝶派还是“迎合社会心理，到处得到欢迎的《礼拜六》派的小册子，其文学价值仍然可以直等于零。”至此他部分肯定了通俗文学中的精品，例如《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等作品，但是对于一些博噱头毫无思想性的很低级狗血的作品仍然反对。这其实反映出他对通俗文学作品的态度是在不断发展的，他的通俗文学观念也是不断地在发展，而不是固定不动的。

综上所述，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应该是重视并研究通俗文学，承认通俗文学对社会

大众的影响，并对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根据文本思想做一个评判。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的批判当然因人而异，是较为主观的，每个人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周作人对通俗文学影响的重视是值得发扬的，他对通俗文学文学价值的看法也从批判转为发现通俗文学的闪光点。他从文本思想着手，配合着自己“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观点，加以批判，而不是一味地否定通俗文学，毕竟有的通俗文学作品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而只是猎奇、低俗的东西。他对通俗文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于任何文化，都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下一棒子打死，而应该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

那么在当代，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否有作用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现代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不再阅读报纸，而是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风靡一时的网络小说成为大众消遣娱乐的一部分，五四时期被批判的文学也有部分被经典化，当然更多的还是那时期的主流新文学，都成为纯文学的一部分。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提醒我们是否陷入他所说的只顾低头研究纯文学，而抛弃或者说忘却了通俗文学呢？

其实正如他所展现的，通俗文学并不一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作品，虽然大多数人会觉得网络小说太低级而嗤之以鼻。可是《水浒传》在以前被认为是“海盜”；《西厢记》被认为是“诲淫”，这都是没有认识到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忽略了作品在那个时代的真正作用，现在《水浒传》《西厢记》都是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写作者，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小说乘着互联网的顺风车进入到无数人的手机、电脑之中，不管承认与否，现在最影响青少年甚至普通人的作品，几乎都是网络小说。笔者认为在当下网络小说就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网络小说因其迎合消费者，自有其缺点的一面。但是不能因此而放弃了对网络小说的研究和了解，不研究通俗文学的话，我们的确不能完整地认识中国。

现在网络小说的影响力日趋增大，许多小说改编成为电视剧、电影，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不管我们对此是褒还是贬，首先要做的是阅读一部网络小说，正如周作人所说：“如非教人不可，那么我只好对他们说，请多看书。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炼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对于网络文学，虽然大多数不能称之为精品，但是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假以时日，网络文学或许也会出现精品，甚至成为载入文学史的作品。

我们对于通俗文学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宽容的态度，但是不是说我们对通俗文学作品质量宽容，而是允许其发展，承认通俗文学的地位。不管是周作人那时的通俗文学还是现在的网络文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存在即合理。这样一个不断学习的态度、宽容的态度也是我们当下人所欠缺的。

(上接第 6 版)小说中最吸引人的对角巷也单独分割出来作为一个文化衍生产品的项目。越剧与《哈利·波特》小说不同，一出完整的越剧最长也只有几个小时，对于越剧剧目的开发可以打组合拳，如建立外景基地、越剧小镇、主题公园，建设越剧文化旅游带。

## 1.国企民营合作越剧小镇模式

2016 年 7 月，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蓝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绿城理想小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开发越剧小镇项目的协议，由三方共同组建嵊州绿城越剧小镇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其中嵊州方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浙江蓝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和绿城理想小镇建设有限公司各出资人民币 3250 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 32.5%。合资公司成立后迅速委托上海济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和绿城东方建筑设计院、上海丁周设计院等单位进行越剧小镇规划设计。越剧小镇规划面积 3.68 平方公里，计划投资 39.8 亿元，以女子越剧诞生地施家畚村为核心，重点建设“一核四区”：一核即一个越剧演艺大观园，四区即越剧创客工坊、田野越剧体验区、越剧风情街、越剧博览馆。

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主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政府主要牵头以下工作：

(1) 新建入镇道路。从甬金高速嵊州市城南出口至越剧小镇建设一条 4.95 公里长的问越路。按照省美丽公路景观双向 4 车道要求设计，由交通部门实施。

(2) 在澄潭江两岸建设防洪堤。投资 5900 万元，由水利部门实施。

(3) 提升改造施家畚、苍岩村镇环境。按

照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要求，把施家畚村的提升改造作为越剧小镇核心区建设一部分。投资 3000 万元，把苍岩列入省级小城镇整治范围，按照越剧小镇的文化特色进行规划。

(4) 其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在新建入镇道路同时进行供水、供电、供气、排污、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配置，实行“七通一平”。上述项目中，入镇道路预算 1.2 亿元，供水配套工程 695 万元，供电配套 3500 万元，排污设施 1.1 亿元，通信配套 70 万元，防洪堤工程 5900 万元，合计需投资 3.3 亿元。

(5) 申报省第三批特色小镇。2017 年 4 月，越剧小镇获批省第三批特色小镇。围绕演艺、文创、休闲观光、运动健身、乡村旅游等五大目标，各项目逐次动工。2018 年 12 月试开放以来，接待游客 6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约 360 万元。

越剧小镇建设中主要问题是：

(1) 机制的挑战。目前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合作的政策未明确，对政府把控项目运营的能力是一种考验。以越剧小镇例，既要按照市场机制让企业自主运转，发挥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灵活自主优势，又要按照政府的意图规范程序高效推进项目，这突出表现在房地比例上。此外，今后政府怎么退出也需要深入研究。

(2) 运营的风险。文化旅游项目投入大、收益慢、资金平衡难。一旦效益差了，对项目持续运营就会产生影响，越剧小镇的美好愿景也就难以实现；此外，根据浙江省特色小镇验收命名办法（试行）省第三批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占比需 70% 以上；旅游产业特色小镇还需通过 4A 级景区验收。如何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统筹兼顾，也是个大问题。

(3) 用地指标审批难。以越剧小镇为例，采用逐年投资方式，随着具体项目进展，1100 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多次审批。嵊州做法是由陈玲芳市长每个月召开一次工作督查会，对越剧小镇项目实行 50 天高效审批服务，尽快依法全面开工建设。越剧小镇项目所需出让的土地，最后分 3 次完成。

2.越剧艺术城：文化与情怀相结合书房商旅项目

越剧艺术城由嵊州广越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3.25 亿元建设。项目占地 26.97 亩，建筑面积 65686 平方米。拟开发建设以文化、旅游、体验为主题的越剧文化交流中心、非遗传承展示中心、文化旅游商业中心。项目配套建设嵊州民俗博物馆、嵊州小吃名街、2 小时城市书房，已与 10 多家旅行社签订定点协议。

实际上，市场上的文化产品不少，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十分广阔。只有对越剧和传统文化的热爱，才让众多消费者毅然决然地投入越剧服饰、人物、剧目产品消费中。如何让越剧产业成为“网红”，秘诀就在于文化与情怀的结合。越剧艺术城内部以嵊州老街命名，如市中心街、大有弄、孩子弄、东后街、鹿山路等，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各种越剧小镇、主题公园、文化产业示范区、越剧文化旅游带内设置不同的园区，主题园内包含各种娱乐设施、演出、体验项目等。可以与高科技相结合，集学、唱、比于一体，增强互动性、打造体验式乐趣，借机拉近越剧与年轻人距离，增加对越剧的理解。

但是一个产业想要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仅靠一点趣味和噱头是远远不够的。越是畅销的产品，越要不断升级品质。一旦产品不过关，损失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无法估量

的品牌效应。绍兴越剧产业的发展要树立统一品牌，但不拘形式，如“组团出海”、专业公司制、职业经纪人等都可尝试。实际上越剧产业也是传播越剧文化的载体之一，并最终以双赢为目的。

## (四)与科技动漫相结合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去年我市举办的以“文产融合·集聚共享”为主题的产业展中，有 2 家互联网企业、1 家与越剧有关的动漫衍生品公司参展，其中 1 家企业曾摘取全省首届电子商务创业创新大赛三等奖。让越剧与科技结合就是引导越剧与科技、创意设计等的深度融合，开发越剧定制产品和服务。要以产品开发促进转型升级，以转型升级带动产品开发，逐步形成上下呼应、合作共赢的产业格局，并形成有利于越剧“传下去、出精品、出名家”的管理体制和保障激励。目前，浙江动漫游戏企业数量近 700 家，去年全年共申报出版国产网络游戏 1960 款，没有越剧游戏。民族风曾经是我国动漫的主旋律。一个好的动漫形象拥有着极强的号召力，不仅能够为越剧带来较高社会声誉，而且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衍生收入。如何在动漫发展中融入越剧元素，已成为政府、越来越多的动漫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年，借国家戏曲振兴东风，我市着力实施越剧振兴工程，使越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越剧传承发展必须从演出主体、产业体系、消费对象入手，注重产业开发和多样化发展，坚持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产业发展与公益服务相结合，发挥越剧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作用。